

# 中央红军会理攻坚战述论\*

刘财富,景志明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会理攻坚战是中央红军长征在四川时的一场重要战斗。因红军伤亡过大且攻城失利,所以当时党内军内非议颇多。本文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分析红军攻城的有利与不利因素,从而说明这次战斗的失利对于中央红军迅速北上并突破国民党大渡河防线仍有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红军;攻取;会理;得失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85-04

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全数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县境,暂时摆脱了国民党中央军与川、滇、黔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有利时机。红军停留会理期间,三军团奉命发起攻夺会理城的战斗。本文通过分析会理攻坚战的有利与不利因素,旨在揭示该次战斗在红军突破国民党大渡河防线中的积极影响。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 中央红军攻占会理城的有利因素

### (一) 刘文辉对红军入境的态度与对策

会理时为川康边区宁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云南与四川的交通孔道,为刘文辉所属川康边防司令部的防区。刘文辉,四川大邑人,1916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川军效力,在其侄刘湘的提携和个人努力下,“十年光景就从上尉参谋升至二十四军军长,成为川康政治军事舞台的重要角色。鼎盛时期的刘文辉官居四川省省主席兼川康边防总指挥,拥兵十几万军队,据有防区七十多县,大半个四川。”<sup>[1]</sup>少年得志,势力看涨的刘氏便有了统一四川军政力量、打出川境、逐鹿中原之雄心,所以两度参与反蒋谋划与战争,其行为毫无疑问得罪了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

1932年冬,为争夺四川全境的控制权,刘文辉、刘湘叔侄之间爆发民国四川最大的军阀混战。刘文辉不敌刘湘、邓锡侯、田颂尧三集团的联合攻击,败退雅安。因刘湘念及叔侄情份,没有赶尽杀绝,刘文辉才有立足川康边区的机会。同时,“二刘大战”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四川提供契机。在以军事实力论政治地位的民国军阀时代,枪杆子是硬道理。刘氏深谙此道,所以他在二十四军内部进行调整,“时而扩团为旅,时而扩旅为师,乘机向蒋介石

中央和四川方面刘湘多要一点饷粮和械弹来维持军实,充实部队”,二十四军三个师和川康边防军两个师的编制,“实际兵力还是不到两万人”。<sup>[2]</sup>这点人马,既是刘氏立足川康的本钱也是他本人政治军事地位的保障。所以,二十四军和川康边防军所有重要位置全是刘氏族人或亲信掌控。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刘文辉“便感觉红军有进入川康模样,(川康)上层人物开始恐慌起来”。5月,红军突然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急电刘文辉,“大渡河天险,共军断难飞渡,薛岳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跟追于后,望兄督励所部,严密防守,务将共军消灭于大渡河以南。如所部敢玩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接到电令,刘氏心情陡然紧张,急召部下商议,如何避开两难窘境。如果刘氏选择与红军硬拚,红军扫平川康这点部队,游刃有余。如若不拚,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赤化川康,刘氏及其部属也就同归于尽。同时,刘部还要防范蒋介石与刘湘进入川康的企图。商量结果,一致同意“只有在堵截红军北上出一点力,对蒋介石多少总还有点讨价还价的资本”。<sup>[3]</sup>

基于蒋介石的威慑与红军入境的担忧以及刘部后来堵截红军的实际情形,能够判断刘文辉及其部属对待中央红军的总体态度,就是凭借自然天险,布防金沙江和大渡河(防卫重点在大渡河一线),阻止红军进入川康边区和继续前进。一旦红军突破金沙江防线,进入川康边,就固守重要据点(会理、西昌、康定、雅安等),等待中央军来援。所有这些军事行动,只是向国民党中央表示一个阻截红军的姿态,二十四军及川康边防军是不会主动出击和攻击红军的。刘文辉对待红军入境的态度与对策是根据自身实力不济的基本判断做出的。这

收稿日期:2011-10-28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2009年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课题“红军长征过凉山史话——‘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精品课程乡土教材研究”(CJS09-048)。

作者简介:刘财富(1971-),男,助教,主研方向:中国近现代史,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现代转型。

是中央红军进入宁属地区和通过西康的最有利条件,也是红军占领会理城的客观有利因素。

## (二) 川康边防军的军事部署

肩负宁属地区防务的是川康边防司令部司令刘元璋,下辖刘元塘旅(四个团),许剑霜旅(两个团),刘元琮旅(两个团),邓秀廷旅(一个团)以及从汉源调来的刘元瑄旅(两个团)外加一些直属部队,约有十二个团,步枪九千余枝,迫击炮三十余门,机枪五十余挺<sup>[4]</sup>。从宁属守军武器装备情况分析,川康边防军的人数和军事实力是弱于中央红军的。所以,刘元璋没有将重兵布防于金沙江沿线,而是在会理、德昌、西昌摆成三线,南轻北重,层层阻滞红军,防卫重点在西昌城。一旦西昌遭遇红军猛攻,固守待援,争取国民党中央军解围。

会理守军为刘元塘旅,因张青岩团被刘元璋留驻西昌,故守卫会理城和金沙江防线的兵力根据刘文辉部的军事编制估计三个团在2500-3000人左右外加一些地方保安团队(这部分战斗力很低)。刘元塘旅三个团和一些地方保安团队要守住会理城和200余公里的金沙江防线,显然力不从心。刘元璋“判断红军不会从云南通会理要道通安入境,所以通安及该地江防由地方保安团队负责,只派二十九团刘北海营协防;此外,刘元璋认为红军会从巧家渡江,将其布防重点放在宁南,派主力二十八团驻扎会理东路;将三十团放在会理西路姜驿、黎溪一带。会理城守军只有二十九团(两个营)、特务营(四个连)和工兵营(两个连)”<sup>[5]</sup>,力量十分单薄。刘元璋在宁属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刘元璋对红军渡江方向的判断失误,实际上使会理成为一座空城。这也是中央红军攻取会理的有利因素。

## 二 中央红军攻占会理的不利因素

### (一) 中央红军的攻坚力不足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和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实力大减。

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据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记载,红军从遵义出发时,“(与长征出发时相比)几乎丧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员和所有的重武器,它无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和两门山炮……号称四个军团——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九军团,而实际只有十六个战斗团。尽管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扩红),兵力仍不到三万五千人。”<sup>[6]</sup>在实施

北进四川战略时,由于土城战斗失利,红军被迫西渡赤水河,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为争取转移中的机动快速,仅有的迫击炮和山炮也抛弃在赤水河中。由于基层战斗人员严重减员(伤亡、掉队、开溜等原因),中央军委在扎西整编红军,充实基层战斗力。除一军团保有师的编制外,其余三个军团之下只有团的编制,因为土城战斗失利“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sup>[7]</sup>

一渡赤水后,红军随之发起强攻永宁城(叙永)的战斗,希望在泸州至宜宾一线打开刘湘部川军防守链条上的缺口,相机过江。但是,没有重武器的中央红军在失去根据地后勤和人员补给的情况下,要夺取坚固设防的城镇显属勉强。因为,这样的强攻常会打成消耗战。永宁城不下已经证明红军攻坚力不足,后来的会理城攻坚战再度验证。

在赤水河两岸来回运动(史家所称“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避战强敌,保存实力,寻求机会从泸州上游过江的过程。所以,红军选择多走弓背路,就是希望在川、滇、黔地方军阀与国民党中央军中出现缺口,一举打过长江。此一时期,红军与川军刘湘部就发生大小战斗33次(一月17次、二月9次,三月7次)。除土城战役、永宁攻城战和3月19日的战斗是红军主动进攻外,其余战斗都是川军主动发起的。红军鲜有胜绩,至多平手。<sup>[8]</sup>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途中,中央红军打了一个胜仗,有所缴获。除此之外,都是快速行军,鲜有休整机会和弹药补给。据《黄克诚回忆录》所记,四渡赤水、兵逼贵阳再由贵阳以东越过公路向云南疾进时,担任全军殿后任务的五军团“(由于)子弹更少,与敌军稍一接触,就垮了下来,拚命向南奔跑,将红三军团的队伍也给冲乱了……一气跑了几十里,好不容易将溃散的部队收拢。”<sup>[9]</sup>

通过以上情况分析,从黔北至会理三个月内,红军一直处于马不停蹄状态。进入会理境内的中央红军已是兵困马疲,粮弹匮乏,极需修整和人员补充。根据红军自身的状况以及仓促之间发起夺取会理城的战斗,要攻下会理实属不易。

### (二) 中央红军失去最好的攻占会理城的时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趁)金沙江两岸空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sup>[10]</sup>指示命令一军团夺取龙街渡,三军团夺取洪门渡,刘伯承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从指示看,当时中央红军第一要务在于保障全体部队安全过江,没有攻占会理城的打算。

5月3日晨,刘伯承率领干部团前卫五连率先突破只有一排敌军防守的金沙江皎平渡口。据刘伯承《回顾长征》一文所载,“干部团过江后,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行至三十里外的高原,击溃川军援敌。”<sup>[11]</sup>刘伯承讲的这次战斗,应是干部团前卫五连打垮在此协防渡口的刘北海营后,次日与会理援军的遭遇战。刘元璠在当天得知通安已失的消息,他认为江流湍急,只有几只渡船,红军大部队不可能一时全渡过来,已渡江的只是少数先遣部队。凭此分析,他率领会理城内的全部驻军,向通安镇方向立即扑来,想用猛烈火力压迫红军退回南岸。于是,干部团主力与增援的刘元璠部队在通安北30公里的望城坡(也说“一把伞”附近)激战。刘元璠亲率的增援部队遭遇惨败,随即溃退。红军占领望城坡高地后,为掩护后续部队过江,没有乘胜追击。

败退会理城的刘元璠约有四百残兵败将,另两团还远在宁南和会理姜驿、黎溪一带,城内一时人心惶惶,他准备弃城逃跑<sup>[12]</sup>。前文所述,尽管红军占领会理有着诸多不利因素,但机会恰在此时出现。这是中央红军夺取会理城的最好机会,如果4日或5日下达攻占会理城的命令,单凭最先过江的干部团就可以轻易占领会理城。但是,由于洪门渡口江水太急,龙街渡口江面太宽且有敌机扫射,5日过江的中央领导人考虑的是一、三军团能否安全过江问题,没有考虑攻城问题。十二团是三军团最先过江的部队(6日过江),政委张爱萍过江后即接到周恩来命令,沿江北上寻找一军团,传达军委命令,让一军团改变计划,火速赶到皎平渡渡江。因为一军团在龙街渡口过江时遇到麻烦,与军委失去联络了<sup>[13]</sup>。7日,三军团全数过江,一军团正向皎平渡口急驰。当天,中革军委仍然没有下达攻取会理城的命令。惨败望城坡的刘元璠意外获得喘息之机,四天时间足够他回收城外部队、扫清射界、布置城防。

### 三 中央红军艰苦的会理攻坚战

准备弃城逃跑的刘元璠后来改变了主意,他认为即便自己跑了,城外的二十八团和三十团因撤退不及也必被歼灭,与其家底丢光且受军法制裁,还不如死守会理城。为向全旅士兵表达与城垣共存亡的决心,他派人接回已离城40里的两位太太。同时,急调东西两团兼程赶回会理集中守城。8日,由西昌来援的聂秋涵团(属刘元璠旅)在刘元璠率兵接应下,进入会理城<sup>[14]</sup>。此时,会理城已有守军四个团外加一些地方保安部队,无疑增加了红军夺城的难度。

同日,中革军委命令三军团攻占会理城。三军

团先头部队进抵会理城郊,占领城外东山寺、西来寺等制高点。第二天,三军团围攻会理不克,十团参谋长邱卓成牺牲。彭德怀杨尚昆眼见攻城伤亡很大,向军委建议放弃攻城计划,以一部监视敌人。但军委指示,继续攻打会理,如强攻不成,应即加紧进行坑道作业,准备12日炸城。10日,三军团继续围攻会理,终因城墙坚固,防守严密,未得手。以后三日,工兵连续坑道作业。14日天黑时,工兵首先在西北角进行爆破,炸出少许缺口,部队趁势向城内冲锋,刘元璠率部堵击,很快堵住缺口。接着,工兵在东北角爆破,因被敌发觉,已往坑道注水,炸城未得手。就在红军强攻会理城时,蒋介石亲自飞到会理上空巡视,投下手令,晋升刘元璠为陆军中将,投下钞票一万元,犒赏全军。守城官兵受到鼓舞,拚死抵抗。七天七夜的攻坚战,三军团承受了重大伤亡,仍没有撼动会理城防。此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意识到,红军仅凭简陋武器,不适宜进行城镇攻坚战,遂下令停止攻城,撤围会理。<sup>[15]</sup>

关于会理攻坚战,当时党内军内非议甚多。三军团干部黄克诚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他认为“我军可以绕过会理直接北上,不必要攻打会理城,决定强攻会理是一个失策。”<sup>[16]</sup>对于黄克诚的看法,可以理解,因为三军团在付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仍没有夺取会理城。

### 四 结语

中央红军的会理攻坚战,既存在着有利因素也存在着不利因素,战斗的失利是多重因素造成的。诚然,如果红军攻下会理,可以扩大红军在当地的影响。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的当地人参加红军,有利于红军的扩红工作;另一方面,也方便红军筹粮筹款。尽管这次战斗失利了,但红军强攻会理的军事行动,迫使德昌守军许剑霜旅退撤西昌,西昌守军也不敢出城设防,客观上为红军从会理北上大渡河让开了一条通畅大道。同时,保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铁厂的顺利进行,统一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党内军内对众多问题尤其是军事分歧问题的认识。再者,这场战斗的失利,也让军委领导认识到红军不具有夺取坚固设防城镇的军事实力,为北上途中放弃攻打西昌城,快速挺进到大渡河畔争取到时间上的主动,赶在国民党增援部队(杨森部)与刘文辉二十四军合围大渡河前突破了大渡河防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会理攻坚战仍有着它积极的历史意义。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刘文辉.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M].北京:三联书店,1979:3.
- [2][3][14]张伯言等.国民党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堵截红军的实况[A].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集第一卷·政治军事编[C].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742,744-745,747.
- [4]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二十四年三月份剿匪军事报告书[A].国长远编选.国民党追剿红军长征档案史料(一)[C].档案出版社,1986:499.
- [5][12]吴剑洲.康南会理阻击战[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C].北京:文史出版社,1991:317,319.
- [6][7][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解放军出版社,1986:147,175.
- [8]张国星.军阀间的矛盾与红军长征[A].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长征新探[C].解放军出版社,1986:122.
- [9][16]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上)[M].解放军出版社,1989:228,229.
- [10]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278.
- [11]刘伯承.回顾长征.星火燎原(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8.
- [13]东方鹤.张爱萍传(上卷)[M].人民出版社,2000:192.
- [15]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在四川[M].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60-61.

##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e Battle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in Hui-li County

LIU Cai-fu, JING Zhi-ming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During the Long March period, the battle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in Hui-li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was an important one. Because casualties were too serious, so many criticisms occurred in the Party or the Red Army. Based on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author thinks the military action taken by the Red Army in Hui-li county had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factors. Though the battle didn't win, it still had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which the Red Army went north rapidly and broke though the Da Du-he river defence set by the army of Kuomintang.

**Key words:** Central Red Army; Attack; Hui-li County; Gain and Loss

(责任编辑:李 进)